

汉赋与丝路文化：汉赋胡人书写及其意义

刘向斌

(延安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在汉代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汉赋中的胡人书写逐渐从模糊性、轮廓化的侧面描写转向细腻、真实的正面描写。总体来看,汉代赋家具有将胡人矮化、妖魔化的创作用意。这既体现了汉代赋家具有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也体现了他们具有“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和“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建构意识。

关键词:汉赋;丝路文化;胡人书写;叙事话语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3-0077-05

收稿日期:2019-04-03

作者简介:刘向斌(1968—),男,陕西靖边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曾被汉朝人视为异类的胡人纷纷由西域、漠北、东南亚、南亚等地进入中原地区,并成为汉代人关注和描写的对象。因此,从文学视角探究汉赋的胡人书写特点,将有助于了解丝路文化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一、汉代史书及出土文献的胡人书写

在汉代,“胡”原指匈奴族群。比如,匈奴狐鹿姑单于曾给汉武帝写信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1]3780}吕思勉指出:“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2]可见,“胡”原为匈奴专称,后亦称北方诸族,当然也是对深目、高鼻、多须者的统称。

汉代史书对“胡人”的描写相对较为简约。比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逐水草而居,“重承诺”“善骑射”“尚利轻礼”“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3]2879}《汉书·匈奴传》云,匈奴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逐草随畜”以射猎为生。^{[1]3834}《史记·大宛列传》称,大宛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

贾,争分铢”。^{[3]3174}可见,汉代史书中的胡人形象相对抽象,但也有比较具体的描写,从中可知胡人具有深目、多须、善商、重利等特点。

而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和汉代胡人石雕像、汉代胡人托灯俑等出土文献中,所刻画的胡人几乎全为男性,形象也更为生动、鲜明。比如,在河南南阳市方城县杨集乡出土的“拥彗捐钺胡奴门”画像石上,刻画了一位“光头蓬发”“左颊黥印”“深目高鼻”“下颚上翘”“身着长衣”的胡奴门吏形象。^[4]在河南新野县出土的画像砖所刻“胡人乞讨”图中,胡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虬髯连须,着长袍,两臂前伸,双手握一袋状物,似在乞讨”。^[5]而在山东多地发现的胡人石雕像,都有深目、高鼻、多须髯等特点。比如,青州石雕“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下颌,双臂细长”,兖州石雕“高鼻深目,头戴尖帽,双手握于胸前,手持弩,直身坐立”,临淄石雕“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高颐尖颌,大耳,椭圆形嘴,牙齿外露,嘴上下两边有阴刻胡须”,邹城石雕“头上似无冠帻,眉骨突出,眼窝内凹,鼻梁细直而隆起”。^[6]广

东、广西等地出土的胡人托灯俑,也“具有高鼻大眼、颧骨略显、脸上有须、下颌稍宽于额部、脸庞较窄、胸部及四肢均遍布毛发等体型特点。”这些托灯俑的人物原型,“应为异域来华的胡人,而非汉人”,很可能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地区的“海上来客”。^[7]

总之,汉代文献中的胡人包括匈奴人、西域人、东南亚人和南亚人等。他们通过陆上丝路或海上丝路进入中原,主要从事门吏、武士、阉牛者、驯象师、杂耍艺人等职业,虽然社会地位低贱,但有较强的生活技能和高超的技艺。

二、汉赋的胡人书写特点

由于胡人有着异于中原人种的形貌与文化特征,从而激发了汉代赋家“以奇为美的审美倾向和丰富大胆的文学想象力”。^[8]因此,他们对胡人的形貌特点、生活技能和文化技艺似乎更为关注,并将他们写入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汉赋的表现范围,赋予其丝路文化特征的时代印记。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汉代赋家对胡人有了进一步了解,汉赋的胡人书写视角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一)模糊性、轮廓化的侧面描写

从今存汉赋来看,诸如扬雄的《长杨赋》、班彪的《北征赋》和杜笃的《论都赋》等西汉后期和东汉早期赋作,多从侧面描写胡人形象,使得汉赋中的胡人形象具有模糊性、轮廓化特点。比如,扬雄在《长杨赋》中写道: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置罟,捕熊黑、豪猪、虎豹、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可见,时至西汉后期,胡人的地位确实很低。我们无法知晓这些胡人的族类,但知道他们像古罗马斗兽场中的奴隶一样,在长杨射熊馆徒手斗兽,与恐惧和死神对决,以勇敢和力量“自取其获”,以求得一线生机。他们只是王公、贵族们取乐、围观的玩偶,更是作者宣扬大汉声威、树立大汉中心立场的对象化存在。

班彪《北征赋》中的胡人虽有明确所指,但形象并不清晰,颇具轮廓化特点:

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据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后固而缮藩。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印于朝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

在该赋中,义渠戎、蛮狄、獯鬻皆为胡人。班彪认为,秦昭王之母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的淫乱为“失贞”,很自然地将义渠戎视为异族贱种。他凭吊因獯鬻乱华而丧生的尉印,盛赞汉文帝以德服人的“怀柔”策略,明显将戎、蛮狄、獯鬻等视为“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从而凸显了大汉中心主义的叙事立场。

杜笃在《论都赋》中所描写的胡人形象,同样有模糊性、轮廓化的特点:

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骠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傲倭,驱骡驴,御宛马,鞭馱馱。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侯隅北,建护西羌。……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

此赋中的冒顿、匈奴、单于、百蛮、罽宾、阏氏、康居、昆弥、西羌等皆为胡人。作者盛赞汉武帝伐匈奴、征西域的丰功伟绩,宣扬了汉军的强大威武,暗含对匈奴、西域诸族不堪一击的嘲讽之意。作者的叙事立场,也与上述二赋无异。

(二)细腻而真实的正面描写

随着胡、汉之间文化交流的日渐深入,时至汉灵帝时期,胡文化甚至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与潮流。据《后汉书》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9]可见,由于汉灵帝痴迷于胡文化,乃至京都贵戚竞相效法,俨然成为一种竞相追逐的文化时尚。这也说明,东汉人对胡人的了解更详细,认同感也进一步增强。由此,诸如王延寿、蔡邕、繁钦等赋家对胡人形象的描写与刻画,也更为精细而真实、具体而生动。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描写的胡人形象比较具体而形象。据其序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如此,鲁灵光殿由西汉鲁恭王刘馀所建。该赋详细描写了灵光殿梁柱上雕刻的胡人图像:“齐首目以瞪眄,徒徒而矜矜,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跼而相对。仡欺以雕穴,頽頽而睖睖。状若悲愁于危处,慄矄矄而含悴。”可见,作者生动描写了胡人有高颧骨、大额头的面部特征,及悲愁蹙额的神态情状。

与《鲁灵光殿赋》描写胡人的形像不同,蔡邕的《短人赋》、繁钦的《三胡赋》则颇为细腻地描写了胡人的真实容貌特征。蔡邕的《短人赋》中云:

侏儒短人,僬僥之后。出自域外,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尫么,略厥倭窳。嚙嚙怒语,与人相距。矇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侶。

赋中的“侏儒短人”形貌丑陋如象父,个子短小似晏子,身材扭曲,行为乖张,嗜酒成性,难与深交。作者称其为僬僥之后、戎狄别种,显然也来自域外。我们知道,古代中原华夏族群总是将四方边境族群分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则“短人”或来自西北某族群。实际上,汉代“百戏”中的侏儒表演项目,可能就引自于西域。比如,东汉李尤的《平乐观赋》描写了汉代“百戏”盛况,就有“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等表演项目。所以,赋中的“短人”很可能就是来自西域的侏儒艺人。蔡邕以戏谑口吻,描写了短人的形貌特点:

雄荆鸡兮鹭鹭鹑,鹑鸡兮鷃鷃雌。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蜚地蝗兮芦即且,茧中蛹兮蚕蠕须,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阉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鞞鞞鼓兮补履朴,脱椎衲兮捣衣杵,视短人兮形如许。

作者分别用雄荆鸡、鹭、鹭、鹑、鸡、雌鹑、啄木鸟等禽鸟类比短人的头部特征,用地蝗虫、芦即、茧蛹、蚕蠕等昆虫类比其腹部特征,而用木门阉、梁柱、劈柴斧、鞞鼓、履朴(鞋楦子)、捣衣杵等器物类比其腿部特征。如此描述,虽然生动形象,但含有歧视、嘲弄和挖苦的成分,显然将胡人予以矮化或妖魔化了。不难看出,蔡邕明显具有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

建安赋家繁钦的《三胡赋》应是残篇。与前面诸赋相比,该赋更细致地描写了胡人的面部特征,对胡人的刻画更为生动而真实:

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頄,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像炙蛄,顶如持囊,隈目赤背,洞頄印鼻。

赋中详细描写了莎车、康居、罽宾等西域诸国胡人的面部特征,并能够突出他们的形貌特点:莎车胡人黄睛、深目、圆耳、窄脸;康居胡人面黑、凸额、高颧骨、深目、瘦脸;罽宾胡人面如刺猬、大头颅、深目、黄须、高鼻梁。作者如此细致的描写,使得赋中的胡人

形象更为生动逼真,如在眼前。

综上,尽管描写胡人的存世汉赋较少,但仍可见胡人书写经历了由模糊到真切、由侧面到正面、由妖魔化到真实化的动态变化。这说明,汉代赋家对胡人的认知与观念随时代而变化,也说明丝路文化的影响力正逐渐走向深入。

三、汉赋胡人书写的意义蠡测

汉代赋家具有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热情,使得汉赋亦具有较为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汉赋中的胡人形象不只是一种文学形象,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所以,汉赋的胡人书写,至少体现了汉代赋家的三个方面的创作用意:

(一) 确立了以汉帝国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汉代赋家们打开了一个感知周围世界的全新窗口。而诸如匈奴、西域诸族等“归义”宾服,更让他们深为汉帝国的强大、威武而自豪。尽管汉朝与周边民族间的关系时密时疏、时战时和,但赋家们用赋笔抒写情怀,歌颂文帝、武帝等英明睿智、神威无敌,借此含蓄地劝谏当下统治者要励精图治、仁民爱物。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四夷宾服、“天下归心”的大一统局面。比如,扬雄在《长杨赋》中写道: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汾沅沸渭,云合电发,飙腾波流,机骇蜂軼,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砰轹輶,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庭。驱橐它,烧燠蠡,分裂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克鏖瘢耆、金铍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顙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焚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蹀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淡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扬雄赞美武帝的雄才大略,颂扬汉帝国兵临四方、声威远播的伟大功绩,表达了维护汉帝国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自信、自觉,确立了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而《北征赋》《论都赋》《短人赋》等,也有相近的叙事话语立场。

其实,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在描写与胡人相关的事项时,也具有类似的叙事话语立场。例如,《西都赋》这样描写长安的天子苑囿:

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

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可见,诸如九真、大宛、黄支、条枝等边境地区出产的大量“殊方异类”流入长安,真可谓“天下归心”的盛世景象。这正体现了作者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二京赋》中也有着类似的描写:

植华平于春圃,丰朱草于中唐。惠风广被,泽洊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东京赋》)

如果从地理方位来看,丁令、南越、大秦、乐浪如众星拱月,分别位处汉帝国的东、西、南、北边境地带。如此,汉都洛阳自然就是世界的中心了。赋中云“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说明作者将汉帝国视为当时世界的中心,以此表达其政治自豪感和大汉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

总之,由于上述诸赋都具有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因而赋中的胡人或为王公、大臣们的玩偶,或为作者批评、指责的敌人,或为他们嘲讽、挖苦的异类,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符号色彩。

(二)具有“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

李泽厚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10]汉朝与匈奴、西域诸族及周边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交流关系,在汉代赋家来看并非一种对等关系,而是一种文化臣服关系。既如此,他们对胡人的描写、塑造,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汉、胡之间具有征服与依附、“怀柔”与“归义”关系等创作主旨。这其实就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

比如,扬雄的《长杨赋》、班彪的《北征赋》和杜笃的《论都赋》等所描写的胡人形象,仅仅是一种概念化存在,是被作为奴隶、敌人或玩偶而写入赋中的。尽管他们最终成为“慕德向义”的“归义”者,但作者有意识地将胡人矮化或妖魔化,“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倾向非常明显。蔡邕的《短人赋》、繁钦的《三胡赋》采用正面描写的方式,使得胡人形象更为鲜明、生动而真实。表面上看,这些胡人被矮化和妖魔化的成分在减弱。但这只能说明,随着时代变迁和汉、胡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渐深入,赋家们对胡人的认知观念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容否认,在观念深处,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胡人当作同类看待,而是作为满足其猎奇审美趣味的一种异类存在。否则,他们绝不会以如此视角去书写和塑造他们的。

当然,汉赋具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

的特点,汉赋中的胡人便是虚实兼备的文学形象。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胡人的矮化、妖魔化描写,还是对其真实、精细的刻画,皆表现出赋家们具有“非我族类”的强烈意识。在他们的创作观念中,胡人“非我族类”,就是一种“异类”存在。

(三)具有“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建构意识

文学“意义场域”的建构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因此,作者在文学文本中的意义表达,只有在读者能够接受、领悟的条件下,才具有文学的意义场域色彩。汉赋作为“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便蕴含着赋家们构筑意义场域的主体意识。

前面讲过,汉代赋家具有以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和“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在他们看来,赋中表达的意义和旨趣,就应该附丽于周边民族必须归依于汉王朝的事实之上。尽管丝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文学视域与空间观念,但也因此使其内心深处的汉帝国中心观念更为强烈而稳固。他们认为,周边异族只有心向“中心”,才是一种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汉赋胡人书写便具有构筑“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的强烈意识。可以说,相关汉赋的话题,都围绕这个意义场域展开。比如,扬雄的《长杨赋》这样描写: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焚东驰。

很明显,在扬雄的文学想象中,汉帝国无疑就是政治中心,周边的异族国家只有慕德归附,才是一种明智选择。否则,他们必遭“天兵四临”的惩罚。也正因为如此,杜笃才在《论都赋》中如此赞美汉帝国的神威:

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鐻鞮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

这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的热烈景象,就是一种“百鸟朝凤”式的虔诚场景的合理想象。同样,班固《两都赋》中的西都长安,在其有限的苑囿空间中,几乎容纳了周边异族国家的所有珍禽、宝马: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西都赋》)

我们知道,九真在今越南河内以南,大宛在今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海岸一带,而条枝则在今伊拉克境内。而这些遥远区域中的“殊方异类”,都是在汉帝国强大的文化引力下,

才源源不断地流入长安,恰如“百鸟朝凤”一般,汇聚于这个世界的中心。因此,赋家的地理视野中所蕴含的政治情怀,也由此发生了显著地变化: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瞻海澨,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东都赋》)

赋中的“河源”即黄河之源,当指西域诸国范围。而“海澨”指东夷诸国,幽崖指匈奴、北狄,朱垠则指南越等地。由此可见,汉朝能够并吞四海八荒,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胸襟!张衡的《二京赋》中亦云:

植华平于春圃,丰朱草于中唐。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东京赋》)

“大秦”是汉代对古罗马帝国的通称。《二京赋》将“大秦”纳入汉帝国版图,让我们在惊叹其夸饰、虚辞之余,感受到其间所蕴含的强烈文化自信。

可见,《长杨赋》《论都赋》《两都赋》《二京赋》所提及的异族诸国,诸如熏鬻、东夷、羌戎、闽越、南越、九真、大宛、黄支、条枝及代表西、东、北、南四个区域的河源、海澨、幽崖、朱垠等,都如众星拱月、百鸟朝凤般拱卫在汉帝国都城的四周。在这里,赋家们不只是对地理分布进行客观描述,而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总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朝与周边异族诸国间的往来日趋密切。汉朝或凭借武力征服,或借助遣使通好,使匈奴、西域各国及其他周边异族国家纷纷前来朝贡、归附。由此,各种物产源源不断地流入

汉朝境内,大量胡人也相伴而来,一并成为汉代赋家关注和书写的对象。不容忽视的是,汉代赋家们之所以具有汉帝国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非我族类”的异族书写观念和构筑“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的主体意识,是因为丝路文化对其创作观、文学视域和政治情怀、文化观念等皆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吕思勉.胡考[C]//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匈奴史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印,1977:45.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张洪静.从汉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论西域文化在汉代的表现[J].文物鉴定与欣赏,2013(10):96.
- [5]赵莎莎.从河南新野汉画像砖中的“胡人”形象看中外文化交流[J].美与时代(下),2012(6):71.
- [6]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J].美术研究,2017(3):41-42.
- [7]黄巧好.广州汉墓出土的胡人托灯俑[J].文物天地,2017(10):40.
- [8]薛幼萍.浅谈汉代文学作品中的西域文化[J].语文建设,2016(12):48.
-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72.
- [10]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1.

[责任编辑 高 锐]

Han – fu and Silk Road Culture: The Image and Meaning of Hu People in Han – fu

LIU Xiang-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Shaanxi)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ilk Road culture in Han Dynasty, the image of Hu people in Han – fu gradually turned its depiction from blurred, outlined to detailed, realistic. Overall, writers of Han – fu have creative intentions to have Hu people belittled and demonized,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y possess narrative discourse standpoint centralizing on the Han Empire, but also embodies their different writing ideas of “non – self race” and consciousness of meaning field construction with the form of “birds paying homage to the phoenix”.

Key Words: Han – fu; Silk Road culture; image of Hu people; narrative discourse standpoint